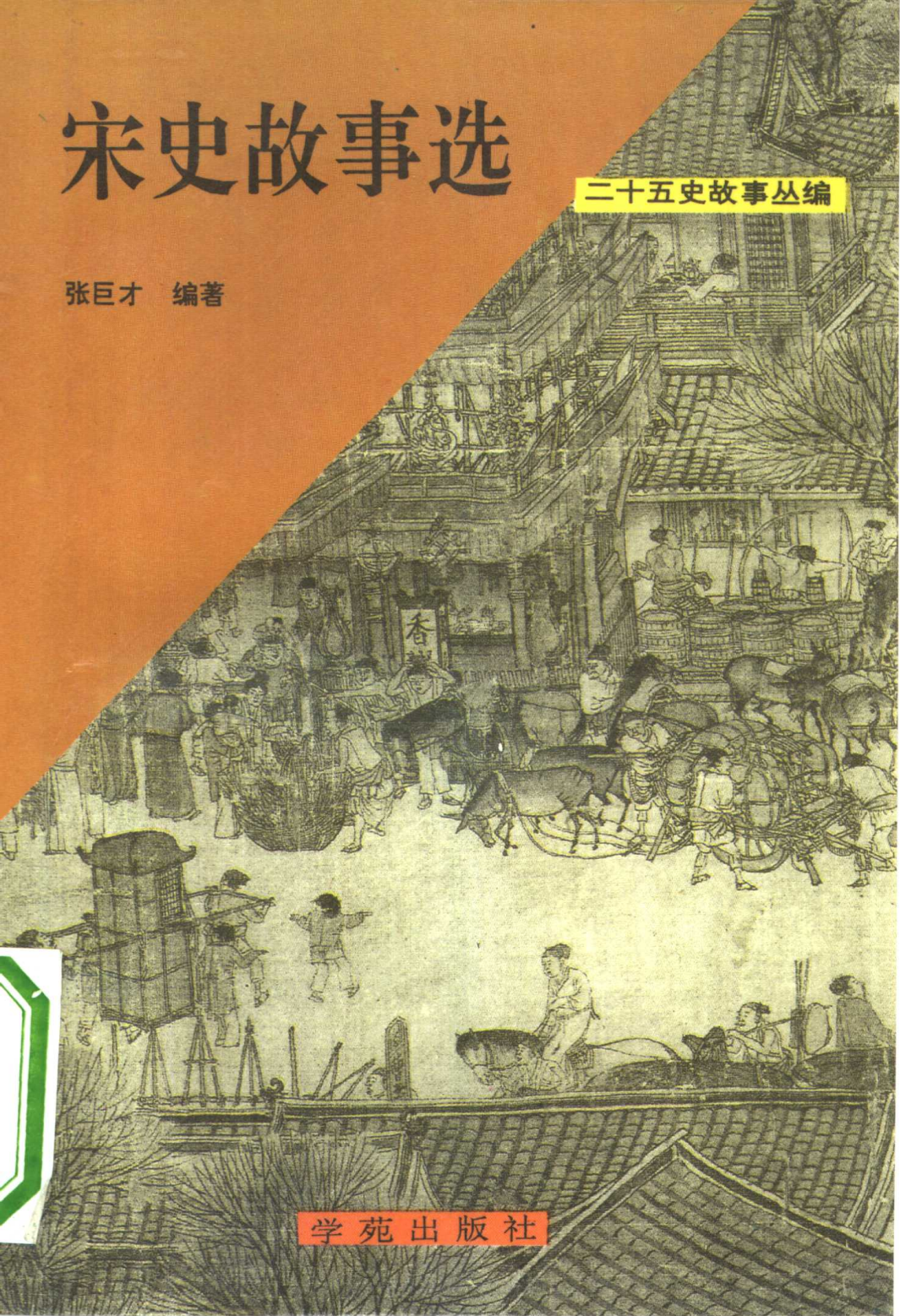


# 宋史故事选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

张巨才 编著



学苑出版社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

张巨才 柳弓田 主编

# 宋 史 故 事 选

张巨才 编著

学 苑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151 号

执行编委：郭 强 陈 辉 田 靖 马进平

杨松岩

特约编辑：杨松岩

责任编辑：田 靖

责任印制：张 翔

二十五史故事丛编——宋史故事选

编 著：张巨才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 33 号

印 刷：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经 销：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6.75 字数：145 千字

印 数：0001—10000 册

版 次：199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362-2/G·276

定 价：3.20 元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前 言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周殿前都点检的身份，与其弟赵匡义、谋士赵普一起密谋策划，在陈桥驿（今开封东四十里）处发动兵变，夺取了后周的政权，赵匡胤称帝，建立了北宋王朝，拉开了宋王朝的历史帷幕。

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是雄心勃勃的，他登位之后并没有满足帝位和一定区域的统治，而是马不停蹄，继续征战，利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和南唐等地方割据政权。赵匡胤死后，其弟宋太宗赵匡义继承帝位，沿着太祖遗志继续前进，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又先后合并了吴越和北汉，至此，才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统一。宋太宗赵匡义还想把辽在今河北、山西占据的区域攻夺回来，可是，在高粱河、岐沟关两次大战失败后，不得以把对辽的攻势改为守势。

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称帝之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和军事整编。他们根据宰相赵普的建议，将权力统统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为了稳定皇帝的宝座，赵匡胤导演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活剧，免去了石守信等人的军队领导权，接着以不同的形式将一大批的开国将领先后免职还乡，提拔一批资历较浅的人员接替他们的职务，便于自己的统治。原来由武人任职的地方高级长官逐渐改由文官担任，原来由地方上任命的县级以上的官员改由朝廷任命，地

方上的精兵统统编入禁军，地方上的财政权划归朝廷专设的机构去管理。然后，又把集中在朝廷的权力划归多头分散管辖，以避免任何部门的权力过大而便于皇帝的绝对统治。这时的政治机构，是以政事、军务和财政并列为三大系统。中书管政事，宰相称“平章事”，但他不能总揽全国军、政大权，而另设枢密院，由枢密使掌管军事；再设三司，由三司使掌管财政。枢密使分管军事，但不能统帅禁军。禁军还分为三个系统，各有各的统帅。不仅于此，规定驻京禁军和守城禁军经常轮换，造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这样，就军队而言，“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见何坦《西畴老人常言》）

北宋初的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军事体制重建，无疑对皇帝的绝对领导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地方割据和军事政变，但在另一方面，萌芽了政治腐化，机构庞大，军队对外作战能力软弱等。

北宋之初，阶级矛盾高于民族矛盾，农民、士卒和少数民族不断举行起义，以反抗剥削阶级的统治，其中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规模最大。公元993年，王小波在青城（今四川）组织农民起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强烈反映了当时农民对财产分配的要求，这比起秦汉以来农民提出来的对人身生存的要求又前进了一步。起义军在王小波的带领下很快发展壮大，朝廷对此非常震惊，马上派宋军前往镇压。994年初，王小波作战身亡。李顺继续领导起义军英勇战斗，很快攻占了成都，控制了剑阁以南、巫峡以北的广大地区，建立了国号大蜀的农民政权。宋军调集重兵围剿

起义军，李顺对宋军估计不足，加之兵力装备有限，宋军很快攻克成都，农民军三万人战死，李顺身亡，这个农民政权宣告失败。

到了真宗、仁宗、英宗的时代，北宋的历史进入了中期，这时的北宋无论是行政机构，还是军队的数量，都大大超过了北宋初年，加之官僚腐败现象的盛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致使北宋王朝进入中衰阶段。

首先是民族矛盾的激化。由于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败，辽国趁此调集大量军队进犯宋朝，一直打到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附近）。辽军接近东京的时候，真宗皇帝吓破了胆，在一伙投降派的簇拥下，急于迁都金陵。在宰相寇准等人的阻止下，真宗亲临澶州前线，率军抗辽，但从骨子里还是畏惧辽军，决意讲和。1005年初，宋以每年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达成和议，暂时缓和了宋辽战争。1044年，辽国又一次对宋用兵，当时宋仁宗比宋真宗还不如，连出战的胆量都没有，只好按照辽的要求在原有的基础上，每年给辽的银绢各增十万，以换取北方边境上的苟安。

北宋除了面临辽的武装威胁之外，仁宗时期，西北部又兴起了一个西夏王朝。西夏兴建之后，一方面向辽用兵，另一方面对宋朝大举进犯，宋朝军队的将领畏敌如虎，每战必败。特别是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好水川（今甘肃隆德县东）、渭州（今甘肃平凉县）三次大战，宋军败于西夏之后，1044年，宋仁宗又以每年给夏银绢为条件，跟夏达成和议，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

到了哲宗、徽宗、钦宗的时候，北宋迈进了它的晚期，北宋灭亡的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公元1125年，金国灭辽之后，

随即转向武装灭宋，仅用了两年的时间，金国大军攻破了东京。这时，徽宗传位给钦宗，金军将徽、钦二帝和所有的后妃、皇族及大臣三千多人掳走北去，北宋宣告灭亡。

北宋京城被金攻克，徽宗、钦宗被俘的时候，徽宗第九个儿子赵构不在京都，没被俘虏，于公元1127年的阴历五月初一，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县）即位做了皇帝，改年号为建炎，他就是宋高宗，从此开始了南宋王朝的历史。1128年，南宋定都杭州，称临安府。勉强建立的南宋王朝，一开始就面临着强大金国的威胁。宋高宗在位的三十五年间，正值金国的强盛时期，他们对南宋的进攻始终没有停止过。宋高宗赵构对金国怕得要死，不敢带领人民向金国发动进攻，夺回被金国侵占的领土，只满足于维持东南的半壁江山，而南宋的人民却纷纷起义，组织抗金队伍，保家卫国，英勇奋斗。宋高宗对于人民的抗金热情视而不见，当金军打下了徐州，渡过淮河，逼近扬州时，他不仅不组织抗金军队进行抵抗，反而一味南逃。他从扬州逃到杭州。又从杭州逃到越州和明州，最后又从定海走海路逃到温州，任凭金军长驱直入。

这时期金军南下的主要目的是掠夺江南的财富和俘虏人口，并没有产生灭亡南宋的想法。1130年初，金军在江南饱掠以后，迅速撤军北归。但万万没有想到，宋军的主战将领韩世忠夫妇在黄天荡设下伏兵，阻截金军。当金军撤至黄天荡时，韩世忠下令出击，与金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号称十万的金军被韩世忠的八千人打得大败，金军将领完颜宗弼被韩世忠打得无路可走，在此处被困困了四十八天。最后，宋军出了叛徒，叛徒引金军从宋军薄弱环节逃跑了。接着，金军准备从静安镇渡江，又受到宋将岳飞的阻击，再度受到沉重

打击。

公元 1133 年以后，尽管金军多次南下，金宋之间互有胜负，而宋军在韩世忠、岳飞等抗金主将的率领下，打得金军不敢应战。1134 年，岳飞军收复了襄阳等六郡。1140 年，刘锜军以二万人在顺昌大破金军十余万人，消灭了金军的精锐部队。同年，岳飞军又收复了郑州和洛阳，跟金军主力在郾城决战，打了一个很大的胜仗，由郾城直逼朱仙镇，离东京只有四、五十里路，已对金国统治构成了极大威胁。然而正在这时，朝廷发生了突然的变化。宋高宗对宋军的一切胜利并未感到高兴，反而产生了对抗金将领的疑忌，害怕自己的皇帝位不能久坐，于是任用了自称从金国逃回来的秦桧为宰相。秦桧做了宰相之后，排斥异己，架空高宗，残害忠良，紧锣密鼓地大搞投降活动。在秦桧的积极策划下，宋朝终于在 1139 年，接受了金朝提出的停战要求，每年向金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不仅如此，秦桧按照金国统治者的旨意，操纵高宗立即要岳飞班师回朝，岳飞一连接到诏书十多次，无奈班师退却，接着被秦桧设计陷害入狱。1141 年，宋高宗再度接受金的和议条款，割让大片土地给金朝，宋金以淮水为界，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水中流，宋还要向金“谨守臣节”，岁贡银绢。这时，宋高宗按照秦桧的意见不仅罢免了韩世忠等人的抗金将领的职务，还秘密杀害了岳飞。

宋金议和后，宗弼控制了金国的政治、军事大权，在贵族内部展开了权力之争。1148 年，宗弼死，这种斗争更加激烈，后来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即皇帝位，这就是海陵王。海陵王以灭南宋为主要目标，积极改革政治，调整朝廷内的领导班子，加强了皇帝的绝对领导。1153 年，他把金朝的政治



中心由上京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的白城子）迁到燕京，为便于消灭南宋创造了有利条件。公元1161年，完颜亮号称率领六十万大军，兵分四路南下。宋军在淮水沿岸不战自退。宋高宗得知消息，吓得又想逃到海上躲避。正当完颜亮要由和州渡江东进的时候，爱国将领虞允文率领宋军在采石镇和金军展开了英勇的拼杀，打得金军狼狈逃窜，扭转了南宋局势。此后不久，金朝廷政变，完颜雍自立为帝，完颜亮无奈，急欲灭宋北归，采取的措施激起将士的不满，被将士乱箭射死，他消灭南宋的计划到此彻底失败。

公元1162年，宋高宗传位于孝宗。孝宗即位之初，任用了抗战派将领张浚，并给岳飞昭雪平反，追复了官爵，积极准备北伐。第二年，张浚派兵北上，很快打下了一些地方。当金军调兵反攻时，宋军因将领不和，在符离战败。这时候，胆小的孝宗发生动摇，罢免了张浚的右相职务，解除了他的兵权，任用秦桧的余党，投降派的主将汤思退为丞相，于公元1165年初，宋金达成和议，条件还是要割让大片领土，献岁币二十万两。

公元1194年，宋宁宗即位，为了稳定民心，开始也做了北伐金军的准备，并且也收复了几个州县。不久，宁宗重新起用投降派，放弃了对金作战。1208年宋金签订和约，宋把每年给金的岁币增到三十万两，还赔偿金犒师银三百万两。这时，金的背后兴起了一个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国连续向金用兵，到1234年，金国被蒙古灭亡，同时结束了宋长期受辱于金国的局面。

昏庸的皇帝，腐败的朝廷，屈辱投降的政策，这样的宋代，只要一天不灭亡，永远也摆脱不了受欺辱的历史。宋结

束了金的欺辱之后，马上开始受蒙古的欺辱。

蒙古灭金后，以南宋为用兵的主要对象。1235年，蒙古兵分两路，大举南侵，向南宋发动了全面的攻势。一路进攻四川，遭到宋军的抗击；另一路进攻襄阳，也遭到宋军的抗击。尽管这样，当时的理宗还是想以议和结束战争，保全自己的皇帝地位，但因蒙古窝阔台汗病死，和议暂停，蒙古军北撤。

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帝位，以开平（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为上都，燕京为中都，后称大都。1271年，定国号为元。忽必烈后来被称为元世祖。

忽必烈初年，忙于贵族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稳固自己的统治，没有急于进攻南宋。而南宋朝廷这时更加腐败，宋理宗重用贾似道这样的二流子为宰相，无辜地残害抗蒙的功臣，大修豪华别墅，过着前所未有的昏庸无道的荒淫生活。

公元1267年，蒙古军开始对南宋大举进兵。忽必烈根据南宋降将提出的作战方案，把攻击的重点集中在长江、汉水之间的军事重镇襄阳和樊城。蒙古军在这一带遇到宋军的顽强抗击，战争相继持续长达六年之久，最后终于被蒙古军攻克。

公元1274年，蒙古军号称二十余万兵马，由左丞相伯颜任总统帅，水陆并进，大举进攻南宋。1275年，芜湖一战，南宋主力全部瓦解。以贾似道为首的南宋文官武将投降、逃跑一时盛行。1276年，伯颜攻克临安，俘虏了宋恭帝及全太后、谢太后北去。

临江城破之前，宋恭帝的两个异母兄弟九岁的赵昰和六岁的赵昺，由人保护送出临安，经海路逃往温州。又由大臣

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护送到福州。这时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在困难的条件下图谋恢复，拥立赵昰为皇帝，后称为宋端宗。公元1278年，宋端宗死，又拥立赵昺做皇帝，这个流亡的小朝廷被蒙古军打得无处藏身，直至追到厓山一带的海上。元军战船团团围住，陆秀夫无奈背起赵昺，跳进大海，张世杰和杨太后的船被海浪打翻，南宋宣告彻底灭亡。这时期有一位很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他终生忠心报国，坚决反元，最后被元军俘虏。他坚贞不屈，终被元军杀害。

从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到公元1279年南宋被元灭亡，宋代经历了长达三百二十年。在这三百二十年间，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对外屈辱下度过的。由于皇帝的昏庸、投降，卖国者获取高官厚禄，爱国抗敌者遭贬被杀，宋代历届朝廷都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像。

宋朝对外妥协投降，但对内却完全不同。无论是在北宋，还是在南宋，无论是什么地方出现农民起义，他们都不惜一切代价，调集重兵，残酷镇压。宋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给镇压了，北宋晚期的方腊起义给镇压了，南宋钟相领导的起义军也给镇压了。总之，宋王朝把对敌作战的力量，都拿来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对外胆小如鼠，对内如狼似虎，这样不堪回首的历史在前代还是不多见的，至少不像宋代这样强烈，令人不可忍受。

宋代许多的皇帝昏庸无道，朝廷腐败之极，奸臣专政误国，但这所有一切，都不能扼杀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他们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都能坚持政治改革、科学研究、文学创作，涌现出一批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和文学家。

宋太祖赵匡胤不愧为一代的开国皇帝。他推翻旧朝，建

立新朝，并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尽管有些措施为后来亡国埋下了隐患，但他毕竟还是一位改朝换代的开国之君，应该给予历史的肯定。

王安石是这时期改革家的代表，他在神宗之时，身为宰相，不顾保守派的反对，积极主张变法，开辟财源，增加农业产量，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充实了国库，稳定了国内暂时混乱的局势。尽管王安石变法最后失败，但其历史功绩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王安石除了实行变法外，在学术上，特别是哲学方面也有很大贡献。王安石认为，物质性的“元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而物质世界是遵循一定规律运转的，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能改变，人们应该遵循这一规律，这一主张曾引起学术领域里的极大震动，后被称为“新学”。他主张“新法”，就是这一“新学”理论的实践。与王安石前后的哲学家还有周敦颐、张载等人，他们的哲学思想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影响。

南宋的朱熹可谓这一时期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理在一切事物之先，而又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世上万事万物都遵循理而运转、变化。对于人来说，理就是性。一切封建道德都是本性所具有的。但本性受了物质欲望的蒙蔽，作出了违反封建道德的事情来，就变成了恶。这种理论，为宣扬封建秩序的合理性和遵循封建秩序的必要性提供了哲学根据，在当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强烈反对朱熹的观点，认为“宇宙即是吾心”，“万物皆备于我”。其实，他的这种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另一个侧面，和朱熹没有根本上的区别。当时与朱、陆有本质区别的哲学思想家，有陈亮和叶适，他们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宇宙间任何普遍

的原则都不能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由于他们更多地强调存在，在大敌当前的南宋，他们先后都投入了抗金斗争，没有著出更有影响的哲学著作。

沈括是宋代的科学大家，他对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制图、气象、物理、化学、冶金、兵器制造、建筑、水利、植物、动物、农业、医药等众多学科都有涉及，并在有些方面独创出新。他提出了二阶等差级数求和的算法，从圆径和高求弓形弧长的算法，提出了改革观测仪器和革新历法的建议，详细具体论述了指南针的性能并有对磁偏角的发现。他所有的科学成果，都集中反映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之中。沈括的科学研究成果，不仅在宋代中国，在世界也有其重要地位。

宋代的史学研究成果也是很突出的，涌现出不少史学大家，其中欧阳修、司马光最有名。欧阳修曾著《新五代史》，并和宋祁合著《新唐书》，为中国史学填写了空白。当然，欧阳修的贡献不仅在史学，更重要的是文学方面。司马光堪称北宋保守派的首领，与变法首领王安石势不两立，是一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者，认为命是最高的主宰，人的贵贱、贫富、智愚都是命决定的，人们应该安心顺从命的安排，与命抗争是没有好下场的。当年王安石变法，正遇天旱，司马光就攻击说“新法”违反了天命，所以老天给予惩罚，滴雨不下。这完全是唯心主义命定论的胡言乱语。司马光在哲学上的成果远比不上他的史学成就。一部《资治通鉴》奠定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司马光耗费了十九年的精力和时间，编撰了这部二百九十四卷的编年史巨著《资治通鉴》，记录了从战国到后周末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来的主要史事，至今仍显示着

它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文学成就在宋代更是辉煌灿烂，作家群起，流派众多，历史上被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这六位当中，“三苏”在诗、词方面也有很大成就。黄庭坚、陈师道的诗词创作，又形成了“以文学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见严羽《沧浪诗话》）的江西诗派，风靡一时。南宋诗词创作集中表现在爱国主义题材，出现了一大批诸如陆游、辛弃疾、李清照、文天祥等诗人和词家，这期间，还有什么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等等。

我们说，宋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宋代也有令人欣慰的一面，他们所创造的丰富的民族文化确实给后人以鼓舞。特别是那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至今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宋代的历史是复杂的，不仅有其自身的复杂演变过程，还有和辽、夏、金复杂的民族关系，对于这样复杂的历史，《宋史》做了较为客观的记录，对宋代三百二十年间的历史事件、人物、制度、科学、艺术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宋史》是元代官修的一部大型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有四百九十六卷，其中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宋史》记载了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年）到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间的历史过程，是一部较为系统、全面地记录两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以及社会风俗的历史文献。它的作者是脱脱（清朝时改译作托克托）等。实际上，脱脱仅仅是由于官居宰相而担任了该书的都总裁主持编修工

作，具体编修工作是由汉、蒙古、回鹘、西夏等族数十名学者集体完成的。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等任总裁官，其中汉族史学家的欧阳玄起了更主要的作用。

《宋史》的编修工作，早在元初忽必烈就曾诏修此书，但因元王朝内部对修撰宋史的体例主张各异，一派要“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一派要“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双方“持论不决”，致使长期未能成形。迟至元末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二月才正式开始了宋史的编修工作，到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全书完成，总共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宋史》在二十四史中以卷帙浩繁著称，两千余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一倍，志的份量也是首屈一指，《食货志》十四卷，相当于《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在二十四史中独一无二。《礼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这样庞大的史书又是在两年半时间完成，不免出现了一些问题，内容杂乱无章、史料剪裁不当、史实考订有误、编纂体例不均、论述是非片面等等，特别是全书内容的不平衡，略于南宋而详于北宋。还有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宋史》是一部官修史书，无疑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树碑立传的，加之编修者道学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致使在人物立传时有不少重大遗漏。诸如著名史学家李昉，著名文学家姜夔、刘克庄，女词人李清照，著名爱国将领王坚、彭义斌，活字印刷的发明家毕升，水利专家高超等，在列传中只字未提。正是因为《宋史》中存在不少问题，所以明代之后的不少史学家从不同的方方面面加以修改、补充宋史，使之更加完善。

《宋史》尽管被后人做了不同程度贬斥，甚至说它在历

代史书中“最为荒烂”（章学诚语），但仍不失其重要的文献价值，有不少资料是原始的、真实的。大家知道，宋代的史学研究很盛行，各朝大多编纂有《国史》、《实录》、《日历》、《会要》等书；加之民间私人著书众多，什么野史、小说、笔记、文集、杂史、编年史等，体裁富繁，无其不有，为后人研究宋史提供了大量国史中所没有的材料。元灭宋后，宋朝大量文献被元朝送至大都，保存在国史院中，因为忽必烈建元之初，就想修宋史，并派人专门搜集有关宋朝史料，进一步充实了国史院，为元末《宋史》的修编提供了方便。元末《宋史》的修撰，主要以宋代的《国史》为底本，辅以《实录》等宋代史料文献，为了速快成书，对原来底本和史料稍加剪裁，有不少是原文照抄，这也是后人指责《宋史》史料选择不当的原因。正是因为元朝大官们匆忙成书，未多改动，宋代《国史》的概貌才赖以保存下来，野史中的文献未被完全删去，从而就使《宋史》更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在不少的人物、事件上可谓是客观的实录。

我们说《宋史》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但它毕竟是一部官修史书，它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竭力美化帝王将相，贬低、歪曲、丑化那些与封建统治不协调的人物和事件，这是以往史书的共同特征。除此以外，它还有和以往史书的不同点，这就是程朱理学即道学贯穿《宋史》的始末，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宋史》“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余事皆不甚措意”。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宋史》最推崇道学，而尤以朱元晦为宗。”程朱理学精神贯穿《宋史》全书，并不奇怪，这是因为修撰《宋史》的主要人物多是道学家的忠实崇拜者，因此，他们在修撰《宋



史》时，竭力鼓吹道学理论，并把道学理论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反动统治者乞灵于孔学、特别是道学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企图，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思想体系，特别是史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

由于修纂者的道学思想根深蒂固，在人物和事件的处理及评价上自然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突出表现在对农民起义和起义领袖的评价上。北宋王小波领导的农民起义，明确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的口号，南宋钟相索性打起了“等贵贱，均贫富”的大旗。对此，《宋史》没有给予客观的历史描述和评价，而是认为这些违背了道学宗旨，破坏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纲领，胡说什么贫富劳役是天理所定，否定和抹煞农民起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因此，农民起义的事迹，只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述，作为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衬托而散见在他们各自的纪传中。仅有的一个《方腊传》，还是作为《童贯传》的附传出现，更不用说性质评价的颠倒程度了。相反，《宋史》对于扼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以及他们的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的双重手段，却竭尽美化之能事。充分暴露了统治者极端害怕农民起义的恐惧心理。

尽管如此，《宋史》仍不失其它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它是反映我国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艺术等综合史书，书中记述了大量的人物，赵匡胤、王安石、杨家将、岳家军、苏东坡、包拯、韩世忠等等，都是值得后人的肯定和赞颂的。

《宋史》卷帙浩繁，给后人特别是青少年和文化水平较差的人带来不少的困难，一是时间不足，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全史；二是文字障碍。为此，我们按史书的前后